

[文化]

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研究回顾与评述(2003-2018)

张博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02年高占福先生发表《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研究的回顾与评述》一文,详细梳理、评述了1935-2002年的西道堂研究。2003年至今,经过学者15年的潜心研究,西道堂研究在之前基础上取得更进一步发展:传统研究领域逐渐深化,新研究领域得到拓展;研究方法日趋多样,研究成果多联系现实、服务社会建设。但与此同时,面对研究中的旧有问题以及新时期对西道堂研究提出的新要求,需要学者继续拓宽并深化相关研究,进一步提升研究水平,扩大西道堂研究在学界的影响,更好地为当前社会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西道堂;西道堂研究;回族;伊斯兰教

10.16023/j.cnki.cn64-1016/c.2019.01.011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19)01-0077-05

自20世纪30年代起,学界对于伊斯兰教西道堂的关注与研究已持续80余年。2002年,高占福先生发表《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研究的回顾与评述》一文,对1935-2002年西道堂研究进行了回顾与评述,总结了成就并指出一些不足。2003年至今,虽仅历经短短15年,但西道堂研究无论在发展速度上,还是质量上,均较之前有较大进展。传统研究领域逐渐深入,新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多元化,相关研究成果联系实际、服务社会建设,成为这一时期西道堂研究的重要特征。但与此同时,高占福先生在2002年所指出的西道堂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而新时期社会建设的需求也对西道堂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此,我们对2003-2018年西道堂研究进行回顾,总结近15年来,西道堂研究取得的进展与成果,并明确相关不足,进一步展望未来的发展。

一、传统研究领域的深化

高占福先生曾指出:西道堂所处的位置、宗教思想来源、“大家庭组织”共同生活是西道堂研究受到人们关注的三个原因^[1]。由这三个关注层面所衍生的西道堂宗教思想、西道堂经济管理模式(特别是与周边地区

收稿日期:2019-01-18

作者简介:张博(1993—),男,内蒙古巴彦淖尔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北方民族史研究。

交流的商业)、西道堂“大家庭组织”生产生活模式以及西道堂教育制度也长期成为了学界关注的主要着力点,研究成果日渐丰硕。2003年至今,学者在西道堂传统研究领域上继续深化,用不同视角与方法使其更加丰富完整。

对于西道堂宗教思想研究,一方面,学界对在刘智思想影响下,马启西先生及西道堂教众将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研究继续保持热度,如张践《马启西与中国传统文化》^[2]、吴艳华《论马启西及西道堂对刘智思想的吸收与运用》^[3]、敏贤麟《从西道堂创建看中伊文化的和谐交融》^[4]、马志丽《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与适应的典范——以西道堂为例》^[5]、马仲荣《伊斯兰教本土化视域下的西道堂研究》^[6]、高占福《西道堂——伊斯兰教中国本土特色的实践者》^[7]、敏贤麟《从刘介廉到马启西——伊斯兰教中国化道路上的两座丰碑》^[8]等文,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刘智思想对马启西及西道堂教众宗教思想的影响,以及西道堂将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独特宗教思想的形成、发展等。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通过研究认为,马启西先生的宗教思想受苏非主义影响。比如,哈正利《马启西宗教思想的来源和特点——马启西遗联解读》^[9]一文,通过对马启西先生16副对联的解读,对其宗教理念的来源,及其中所蕴含的苏非主义特点进行了分析。李晓瞳《马启西苏菲思想溯源》一文则认为“马启西的苏菲思想可以追溯至纳格什班迪苏菲教团。他从多个方面间接地吸收了该教团的思想,在新的历史境遇下,对其作了一定的继承和扬弃,付诸实践,使其呈现出新的特征”^[10]。虽然在相关问题上,部分学者之间存有分歧与争论,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将西道堂的宗教思想研究推向更深层次。

在经济管理模式方面,西道堂自建立以来,坚持农、林、牧、商多元经济生产,经济层次多,涉及面广,且各业之间相互配合,使西道堂拥有较为坚实的经济基础。自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王树民、于式玉等学者便对西道堂的经济管理模式作了介绍。2003年后,学者们开始在前人梳理基础上,进一步总结西道堂独特的经济管理模式,如马志丽、丁耀全《西道堂复合型经济模式与管理模式探析》通过对西道堂农、牧、林、商等方面经营的分析,认为“西道堂复合型经济农牧兼营、农商并重,以商、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方式形成了多元产业链,是一种内生性商业经济外向性农、林、牧等产业不断延伸扩大的结果”^[11]。其中,西道堂独特的“两世兼营的‘乌玛’大家庭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模式,集中所有西道堂人的智慧和能力,将伊斯兰教信仰和经营两世的生活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充分调动了西道堂人的积极性,构建各行各业协调互动、运转有序的复合型经济结构模式,使商、农、林、牧、副、渔等在同一个经济链条上发挥着各自应有的作用”^[11]。丁耀全《西道堂多元经济结构及管理模式探析》对西道堂农、林、牧、副、商等行业发展作了梳理与分析,认为西道堂多元产业的经营,不仅使各产业相互配合补充,从而获得较大收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西道堂防范风险的能力。而西道堂经济经营的成功得力于其多元经济组织在内有一套合理高效的管理机制,在外能够及时把握商机、积极开拓市场^[12]。

此外,对西道堂经济发展的研究,学者们不仅总结西道堂整体经营发展模式,而且对各行业经济也有很好的研究。比如,丁谦、马德良《浅谈解放前西道堂的农业经济》对解放前西道堂的农业发展情况进行了梳理与总结^[13]。敏俊卿《中间人:流动与交换——临潭旧城回商群体研究》对西道堂创业历程及其商业经营管理进行了介绍总结,特别强调其作为中间人在区域商业中的杰出作用^[14]。韩海蛟、周雨城《行走在回藏之间——民国时期西道堂商业活动研究》则以西道堂在安多藏区的商业活动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其贸易范围、内容、规模、经营管理方式,与藏民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认为“西道堂在临潭——汉、回、藏民族交界地带,利用商业活动促进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友好相处,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5]。

在教育方面,近些年来,学者对西道堂女性教育的关注与研究逐渐加大。比如,马雪莲《从书斋到学堂:1949年之前的西道堂女性教育》,在梳理解放前西道堂女性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深入阐述了“汉克塔布”宗教传承方式、教长思想社会环境等因素对西道堂女性教育的影响。将西道堂女性教育研究由史实梳理展现逐渐转向更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分析上。通过分析,作者认为“教育的发展始终脱离不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特定时代背景之下的人。教育在输出文化的同时,也在建构文化”^[16]。苏诗洋《临潭西道堂兴办回族女童新式教育的顾与反思(1890-1958)》一文,作者首先从20世纪初妇女解放运动兴起的大背景入手,将关注目光集中于西道堂,通过对相关史实的梳理分析,将西道堂女性教育分为萌芽(1890-1919年)、成熟(1919-1943年)、发展

(1943-1958年)三个阶段,并对三个阶段各自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之上,重点论述了西道堂女性教育对当地女性自身(主要从自身素质、意识形态、社会地位、日常生活四个方面)以及当地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最后,作者对西道堂女性教育的宝贵经验作了总结与反思,认为其可为当下的回族女童教育提供借鉴^[17]。

西道堂独特的“大家庭组织”生产生活方式长期以来是学界关注的热点。2003年以来,学界在继续对西道堂“东方乌玛”的形成、发展及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基础上^[18],逐渐开始从建筑、平面设计、装饰艺术等路径对西道堂大房子建筑进行深入研究,如陈建红、李茹冰《中国回族的“乌玛”建筑——甘南临潭西道堂“大房子”的色彩与装修》^[19]、《甘南临潭西道堂“乌玛”建筑特色探析》^[20]等。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西道堂“大家庭组织”所在的居住空间结构,也能从建筑学的角度印证西道堂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

综上所述,在西道堂“宗教思想”“‘大家庭组织’生产生活方式”“西道堂教育”“西道堂经济管理模式”等传统研究领域,15年来,学者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更加精进,利用多视角、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继续深入,取得众多新的突破,并且注意将研究与当前社会建设需求相结合,这不仅丰富了西道堂的整体研究,也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范围的拓展

2003年至今,相关学者在继续探索传统问题基础上,也开始拓宽西道堂研究的领域,使西道堂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完整。

西道堂研究史的成果开始涌现。长期以来,学界对西道堂研究史鲜有关注,专门论述西道堂研究史的著作更是微乎其微。2003年以来,这一研究状况发生改变,关于西道堂研究史的著述开始出现。比如,张建芳《尹世彩与〈马启西先生传〉》以一篇佚名文献《马启西先生传》为关注点,通过调查与考证,得出《马启西先生传》的作者为清末岷州进士尹世彩,其也应为“目前所知对马启西先生和伊斯兰教西道堂进行研究的第一位汉族知识分子”^[21]。同时,作者也对汉族士人尹世彩关注马启西先生及西道堂的原因进行了思考,认为儒家士人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的思想传统及马启西先生将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思想的吸引力,使得尹世彩撰写了《马启西先生传》及介绍马启西先生与西道堂的相关情况。马景《安献令与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研究》通过对英国传教士安献令著作《中国西北的伊斯兰教》(The Crescent in North-West China)中对马启西与西道堂、西道堂抵抗白朗、马启西遇难、采访敏志道等记述的梳理,认为安献令是目前所知第一位关注、研究西道堂的外国人^[22]。李宽硕士学位论文《他者眼光与自我阐述——伊斯兰教西道堂研究史》,则直接将西道堂研究史作为关注对象,对20世纪20年代至21世纪初的西道堂研究历程作了系统梳理,并将各时期不同研究者的研究分为“他者眼光”(如范长江、顾颉刚、王树民等西道堂外部学者)与“自我阐述”(如丁正熙、丁士元、敏俊卿等西道堂学者)两种,对两者进行对比分析,认为“纵观西道堂研究整个历程,‘他者眼光’与‘自我阐述’大都联系密切,互相补充,交相辉映”,二者共同推进了西道堂研究,“而在西道堂研究中,‘他者眼光’与‘自我阐述’必然也在国家与西道堂两种权威的影响下进行撰述分析,以求一种磨合无冲突的观点结论,这样的结论也是一条正确的现实道路”^{[23](P40)}。

西道堂精神方面的研究有新突破。西道堂精神内涵丰富,马明良先生在《西道堂精神及其当代意义》中,将西道堂精神概括为“以伊斯兰教义为指导,以群体合作精神为基础,全面推进道德、经济和教育三者协调发展”^[24]。2004年,马逢春先生提出“西道堂对宗教教义的阐发,充分肯定了以本国文化宣扬伊斯兰教义的原则,强调注重实践,凡事当躬行,要求必须具有明显的公认的社会目的,有益于大众,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的成己成仁的生活准则”^[25]。在此思想下,为爱国主义精神、为集体服务精神、艰苦奋斗精神、重视教育精神、民族团结精神、社会公益精神等,均是西道堂精神的具体体现。同年,牟钟鉴先生也对西道堂精神进行概括,分别为“把伊斯兰教信仰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把爱教与爱国结合起来”“发扬中华文化的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精神,把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与宽容忠厚的博大情怀结合起来”“把发展教育作为民族和宗教的振兴之本”等^[26]。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西道堂精神的丰富内涵将会得到进一步发掘与丰富,继续助力和谐社会的建设。此外,在甘肃省外西道堂研究^①、西道堂内部群体研究^②、西道堂杰出人物研究^③等方面亦有拓

展研究,此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2003年以来的15年,西道堂研究在传统研究领域上继续深入、细化,而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在积极拓展。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除了传统民族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方法外,政治学、经济学、建筑学、艺术学、地理学等方法也开始有所呈现,多元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使西道堂研究在短短15年内取得较大发展。而且学者们时刻不忘关照现实,使西道堂的研究成果能够为和谐社会建设、民族团结巩固等贡献力量。

三、目前的不足与展望

2002年,高占福先生在《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研究的回顾与评述》一文中指出:“西道堂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绩,但冷静的思考,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至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从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上全面论述西道堂历史与现状的专著,对刘智宗教思想何以对西道堂产生影响的深层次原因,大家庭集体生活制度的社会意义与时代背景,西道堂重视经济与教育发展的现实意义等方面重视不够,研究的水平也不高,甚至很少涉及。对西道堂的调研也多是浅层次的,或走马观花,或以点带面,或借题发挥,或游离于主题,华丽的文字包裹着苍白的内容……西道堂研究中的这些种种不利的现象,都是今后研究中必须注意克服的。走进西道堂,走进西道堂的教众,走进西道堂现在或将来的生活轨迹,是西道堂研究更上一层楼的必经之路。”^[1]

经过十余年的研究,我们发现,在诸如刘智宗教思想对西道堂产生影响的深层次原因分析、大家庭集体生活制度的社会意义与时代背景、西道堂重视经济与教育发展的现实意义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开始逐步加强,但仍然需要长时间继续完善深入。而高占福先生所提到的一些问题,至今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在西道堂经济研究方面,目前对于西道堂整体经济运营模式的研究成果颇多,但需要更全面地展示西道堂经济运营模式的形成及影响,并能总结出更多成功经验以为当今地方经济建设提供借鉴;而在各产业研究上,目前研究多集中于商业,而关于农业、牧业、林业则关注相对不足。在“大家庭组织”生活生产模式的研究上,需要继续保持多元研究视角与方法,获取更多学术问题,进一步提升对“大家庭组织”生活生产模式的认识,并注意其对当今社会建设的积极意义。

在拓展研究领域方面,需要完善对西道堂研究学术史、西道堂杰出人物、甘肃省外西道堂等领域的研究,使西道堂研究更加丰富,并能实现与更多学科领域的交流对话。此外,对西道堂史料的挖掘也有待加强,要从地方文献,地方报刊资料,国家对当地自然、社会的调查统计资料,国内外士人文人笔记、日记、考察报告,民间故事、歌曲、谚语、民间私藏手写本等材料中搜寻整理相关史实,更为重要的是对西道堂长者及当地其他民族老年人进行口述史访谈,使西道堂史料更为丰富细致,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整理出版新的《西道堂史料辑》,推进西道堂研究。与此同时,人类学、社会学的调查也要加强,要长期真切深入到西道堂民众之中,走近他们、了解他们,借助专题论文、调查报告、学术著作、影视资料等方式,使外界认识、了解更真实的西道堂。此外,大部分西道堂民众生活在临潭及周边地区,面对当地复杂的自然环境,西道堂民众进行合理开发和多元经营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也有待总结,以助力当今生态文明建设。

四、结 论

2003-2018年西道堂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西道堂宗教思想、西道堂经济管理模式、西道堂“大家庭组织”生产生活模式以及西道堂教育制度等四个传统领域的研究继续深入,成果日渐丰硕。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在诸如西道堂研究史、西道堂与当前社会建设、西道堂杰出人物研究、甘肃省外西道堂民众研究等领域上积极拓展。而在研究视角与方法上也日趋多样,目前,西道堂研究涉及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相关学者也开始加强合作研究。而在学术研究的同时,学者们注重关照现实,积极主动将西道堂研究的成果与和谐社会建设、教育体制完善、民族团结巩固等相联系,为当前社会经济建设提供借鉴。

在取得成就的同时,西道堂研究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传统领域的研究深度有待进一步加深,而新拓展领域则需要积极巩固。在西道堂史料方面需要进一步搜集整理,特别是当地的口述史料。而西道堂的人类学、社会学调查也需要长时期的深入进行,贴近西道堂、西道堂群众。虽然,目前的西道堂研究仍然存在许多不

足与有待完善之处,且“一部从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全面论述西道堂历史与现状的专著”也仍没有出现,但随着西道堂研究的视角、领域、方法的逐渐拓宽,相关学者及学术队伍的成長,再加上政府社会的大力支持,未来的西道堂研究势必取得更大成就,不仅将在宗教、哲学、历史、民族等学术界中产生影响,也会在当前与未来的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建设中也将大有可为。

注释:

- ①如马仲荣《民国时期西道堂在青海的发展及其结构特征》,《回族研究》2016年第3期。
- ②如马志丽、丁耀全《血缘、姻缘与亲缘:人类学视野下西道堂人亲属关系探析》,《回族研究》2015年第4期;马雪莲:《拟制家庭中的女人——西道堂妇女的角色》,《北方民族大学》2012年第5期。
- ③如杨怀中:《马启西先生传略》,《回族研究》2003年第2期;林松:《从诗联看马启西先生的理想、实践与奉献》,《回族研究》2003年第2期;敏生光:《正气与人格的典范——马明仁》,《中国穆斯林》2006年第2期;敏俊卿、刘聪颖:《生命的光华——纪念知名回族学者丁正熙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回族研究》2011年第4期。

参考文献:

- [1]高占福.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研究的回顾与评述(1935-2002)[J].世界宗教研究,2002(4).
- [2]张践.马启西与中国传统文化[J].宗教与民族,2004.
- [3]吴艳华.论马启西及西道堂对刘智思想的吸收与运用[D].石河子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06.
- [4]敏贤麟.从西道堂创建看中伊文化的和谐交融[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6).
- [5]马志丽.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与适应的典范——以西道堂为例[J].青海民族研究,2008(3).
- [6]马仲荣.伊斯兰教本土化视域下的西道堂研究[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2(1).
- [7]高占福.西道堂——伊斯兰教中国本土特色的实践者[J].西北民族研究,2014(3).
- [8]敏贤麟.从刘介廉到马启西——伊斯兰教中国化道路上的两座丰碑[J].回族研究,2017(4).
- [9]哈正利.马启西宗教思想的来源和特点——马启西遗联解读[J].中国穆斯林,2010(4).
- [10]马志丽,丁耀全.西道堂复合型经济模式与管理模式探析[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5(6).
- [12]丁耀全.西道堂多元经济结构及管理模式探析[J].对外经贸,2016(10).
- [13]丁谦,马德良.浅谈解放前西道堂的农业经济[A].回族研究文集(上)[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 [14]敏俊卿.中间人:流动与交换——临潭旧城回商群体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03.
- [15]韩海蛟,周雨城.行走在回藏之间——民国时期西道堂商业活动研究[J].荆楚学刊,2013(3).
- [16]马雪莲.从书斋到学堂:1949年之前的西道堂女性教育[J].青海民族研究,2016(4).
- [17]苏诗洋.临潭西道堂兴办回族女童新式教育的顾与反思(1890-1958)[J].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04.
- [18]廖君湘,管龙陵.对“西道堂”大家庭式经济活动模式的新认识[J].船山学刊,2004(4).
- [19]陈建红,李茹冰.中国回族的“乌玛”建筑——甘南临潭西道堂“大房子”的色彩与装修[J].小城镇建设,2003(7).
- [20]陈建红,李茹冰.甘南临潭西道堂“乌玛”建筑特色探析[J].华中建筑,2007(4).
- [21]张建芳.尹世彩与《马启西先生传》[J].回族研究,2006(1).
- [22]马景.传教士安献令与中国西北伊斯兰教研究[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5).
- [23]李宽.他者眼光与自我阐述——伊斯兰教西道堂研究史[J].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05.
- [24]马明良.西道堂精神及其当代意义[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6(3).
- [25]马逢春.西道堂精神[J].宗教与民族,2004.
- [26]牟钟鉴.可敬可爱的西道堂人和西道堂精神[J].宗教与民族,2004.

责任编辑:马晓琴